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 古代文明

(第8卷)

|                               |         |
|-------------------------------|---------|
| 泥河湾盆地细石器技术、年代及相关问题.....       | 王幼平     |
| 初期仰韶文化研究.....                 | 韩建业     |
| 马家窑文化的分期、分布、来源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丁见祥     |
| 渤海南岸地区商周时期盐业遗址群结构研究.....      | 燕生东     |
| 周原遗址西周时期人群构成情况研究.....         | 马 赛     |
| 楚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高崇文     |
| 襄阳地区汉末魏晋墓葬初探.....             | 韦 正     |
| 唐代县令墓研究.....                  | 齐东方     |
| 辽南区汉人墓葬壁画题材研究.....            | 霍杰娜     |
| 三皇庙铜祭器及其相关问题.....             | 杭 侃 彭明浩 |
| 楚简中从“大”声之字的读法.....            | 董 珊     |
| 《地理新书》的成书及版本流传.....           | 沈睿文     |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 古代文明

(第8卷)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10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印制 梁秋卉  
责任编辑 王 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文明. 第8卷/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010-3074-3

I. ①古… II. ①北…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  
古代-丛刊 IV. ①K220.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3796号

古 代 文 明

(第8卷)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21.5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074-3 定价:128.00元

# 目 录

|                                |                |
|--------------------------------|----------------|
| 泥河湾盆地细石器技术、年代及相关问题 .....       | 王幼平( 1 )       |
| 初期仰韶文化研究 .....                 | 韩建业( 16 )      |
| 马家窑文化的分期、分布、来源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 丁见祥( 36 )      |
| 渤海南岸地区商周时期盐业遗址群结构研究            |                |
| ——兼论制盐业的生产组织 .....             | 燕生东( 88 )      |
| 周原遗址西周时期人群构成情况研究               |                |
| ——以墓葬材料为中心 .....               | 马 赛( 138 )     |
| 楚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 高崇文( 163 )     |
| 襄阳地区汉末魏晋墓葬初探 .....             | 韦 正( 204 )     |
| 唐代县令墓研究 .....                  | 齐东方( 220 )     |
| 辽南区汉人墓葬壁画题材研究 .....            | 霍杰娜( 255 )     |
| 三皇庙铜祭器及其相关问题 .....             | 杭 侃 彭明浩( 267 ) |
| 楚简中从“大”声之字的读法 .....            | 董 珊( 285 )     |
| 《地理新书》的成书及版本流传 .....           | 沈睿文( 313 )     |

# 泥河湾盆地细石器技术、年代及相关问题

王幼平\*

Since 1965,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microlithic remains have been found in the Nihewan basin. These indicated that it is not just the wedge-shaped core, the boat-shaped core and the conical core technology existed in the basin too. The boat-shaped and conical cores first appeared in the east part of the basin by about 18000 – 20000 BP, and the wedge-shaped core technology dominated the middle and west regions from about 15000 to 10000BP. Unlike that the wedge-shaped technology suddenly disappear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Holocene, the conical core continued to be found in some early Neolithic sites. The special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microlithic technology in the Nihewan basin should closely relate with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human adaptations as well as migr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Pleistocene.

泥河湾盆地自早更新世以来就是远古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sup>[1,2]</sup>。1965年，王择义先生等在盆地中部虎头梁村附近发现细石器，随后几年，盖培、卫奇先生等在该地区进行连续数年的调查与发掘，发现虎头梁遗址群并进行研究<sup>[3~5]</sup>。1980年以后，谢飞先生等继续在盆地内进行工作，又发现油坊、籍箕滩、马鞍山、瓜地梁、二道梁、黑土坡等一系列含细石器遗存的遗址<sup>[6,7]</sup>。

泥河湾盆地丰富的细石器文化遗存一直受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者关注。自其发现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对盆地内细石器技术与文化特点、时代、人类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等相关课题进行讨论<sup>[8,9]</sup>。围绕着这些课题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也在持续进行并不断有新发现。这些发现与研究成果为认识晚更新世末期人类在泥河湾盆地的活动历史与行为特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近些年来一系列新资料的发现为我们探讨上述课题提供了新契机。本文拟简要介绍泥河湾盆地已发现的主要细石器遗存，并进一步探讨细石器技术、年代及相关问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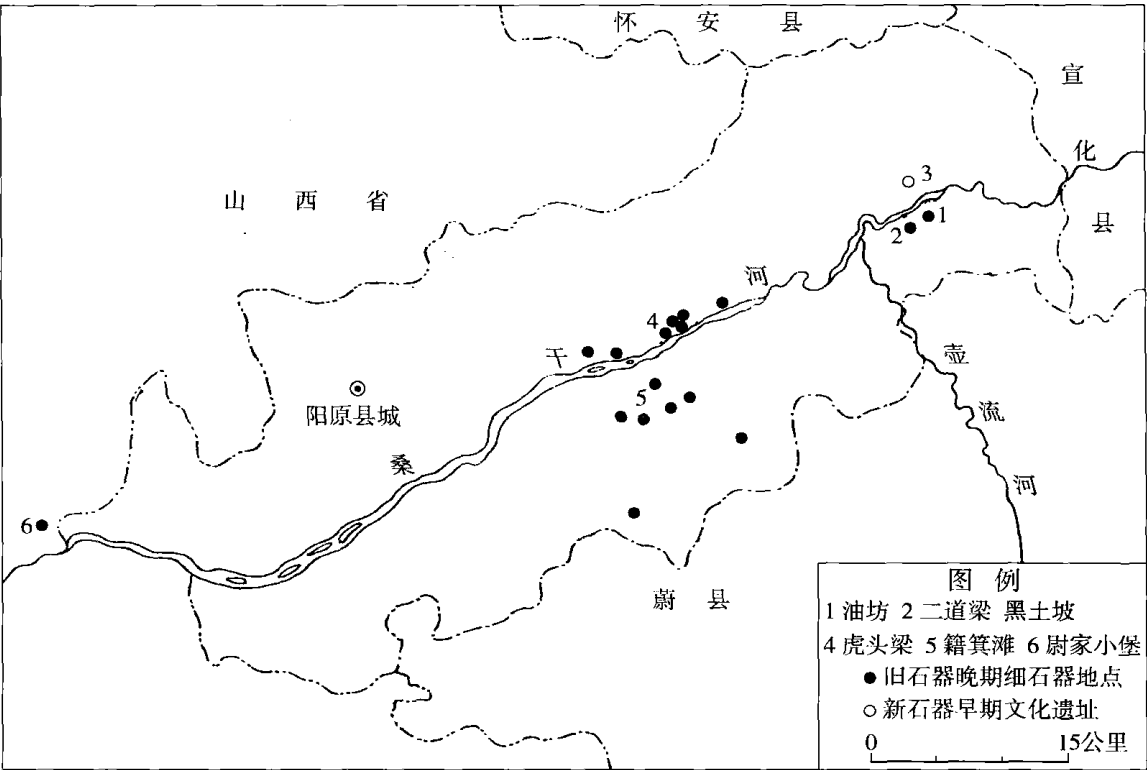
\*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 一、细石器工业的发现

泥河湾盆地位于北京西北约 150 公里，是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山间盆地。西接大同盆地，南连蔚县盆地。也有学者将几者放在一起，统称广义的泥河湾盆地<sup>[10]</sup>。盆地北倚熊耳山，南为恒山余脉。盆地东西长 80 多公里，南北宽 20 多公里。桑干河自西向东，纵贯盆地。沿河两岸发育着不同高度的河流阶地，盆地中央的阶地面上及两侧近山的洪积扇上也有黄土状堆积。与泥河湾盆地古地理变化情况有关，盆地内时代较早的旧石器遗存主要发现在盆地边缘的古湖滨地带。到晚更新世，随着泥河湾古湖的消失与桑干河的形成，盆地中部桑干河两岸的阶地上也开始出现人类活动的踪迹。已经发现的细石器遗址主要分布在桑干河或其支流的阶地或黄土状堆积中。其中，盆地中部的桑干河两岸阶地上的分布最为集中，先后发现有虎头梁遗址群、籍箕滩遗址群，向西已达山西境内的尉家小堡。盆地东部的黄土台地上也有油坊、二道梁以及黑土坡等遗址发现（图一）。

#### （一）虎头梁遗址群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在泥河湾盆地中部的虎头梁村附近，曾先后发现 9 个细石器工



图一 泥河湾盆地细石器遗址分布图（据谢飞，1991 改绘）

业地点。这些地点的编号分别为 65039, 65040, 72117, 73101, 73102, 73103, 73104, 73105 以及 73107。近些年来,在这一地区又有一些新地点发现,如西水地村西南的马鞍山遗址与虎头梁村西南的瓜地梁遗址等。这些地点的文化遗物大多发现于桑干河 2 级阶地的砂质黄土层中,仅有个别出自砾石层。总体来看,砂质黄土的上部呈黄褐色,胶结坚硬,含小砾石;下部则呈棕黄色,且具大量的棕色斑点,胶结也较坚硬,垂直节理发育,含丰富的石制品及动物化石等<sup>[11、12]</sup>。近年来先后发掘的马鞍山、于家沟与瓜地梁等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显示了虎头梁地区不同遗址的功能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其埋藏条件也有所不同。

于家沟遗址(即原 65039 地点)位于泥河湾湖积层形成的陡坡前缘,附近又紧邻长年不断的泉流。坡积物以及泉水的影响,使得当时人类活动的遗迹没有能够清楚地保存下来。但遗址的地层堆积却可以清楚地划分出 7 层:从最下部直接叠压在泥河湾湖相层的基座上的砂砾石层开始就有较丰富的楔形石核等细石器文化遗物发现;向上依次为灰绿色粉砂质土与棕黄色中粗砂层、棕黄色砂质土层、灰黄色黏质粉砂层、黄褐色黏土质粉砂层、黑褐色粉砂层以及表土层。地层堆积的变化以及所含的文化遗存的内容,很清楚地显示了本地区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的环境变迁与文化发展<sup>[13]</sup>。

马鞍山遗址的堆积属于典型的阶地堆积,最下部是黄褐色砂砾石层,其上为灰黄色砂质土层,厚达 3 米以上,含丰富的细石器文化遗存。除数量众多的文化遗物外,还有 30 余处火塘遗迹发现。该遗址位于桑干河与其一条较大支流的交汇处。遗址背靠马鞍型小山包,前临桑干河谷,是一处背风向阳,适于早期人类居住的好地方。马鞍山遗址由多层火塘为代表的居住面叠加而成的巨厚文化堆积,清楚地显示当时人类曾经在此长期居住<sup>[14]</sup>。

与前两者不同,瓜地梁遗址的堆积则较为单纯,在表土层下即是由砂砾石层与砂质土构成的阶地堆积。文化层为浅黄色的砂质土,在剖面上可见两个文化遗物较为集中的分布带,被砂砾石透镜体所分隔。石制品、动物骨骼碎片围绕着红烧土与灰烬遗存构成的火塘遗存分布。数量不多,堆积也较薄的文化层说明当时人类只是在此临时居住<sup>[15]</sup>。

无论是早期发现和发掘的遗址,还是上述几处新近的发掘,都有与文化遗物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发现,包括野马、野驴、鹿、羚羊、鸵鸟等 10 多种动物。虽然化石的数量较多,但大多数已经相当破碎,还有的带有明显被火烧过的痕迹。动物群的生态特点说明当时应该是草原环境。

虎头梁遗址群所发现的石制品非常丰富,仅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发掘的 9 个地点所发现的各类石制品就多达 4 万件。近些年来再次发掘出土的石制品则更为丰富。其中于家沟与马鞍山两处新发现的石制品数量各自均达到 3 万件以上。无论早期还

是新近的发现，石器原料均以石英岩（亦有学者鉴定为火山角砾岩、硅质岩等）为主<sup>[16,17]</sup>，少数为燧石和流纹岩。石英岩的质地硬而脆，多呈鲜艳的粉红色，主要应采自泥河湾盆地南侧的山区，遗址距石料产地的距离在十至数十公里以上。遗址附近桑干河滩的砾石中则很少有合适的石料可用，仅个别石料可以确定是来自河滩的砾石。

石器组合以端刮器为主体，长身端刮器和短身端刮器的数量比较接近。其次是各类尖状器，也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引人注目的还有底部修理者，明显是为了加柄所用。再次为各类边刮器，有半月、盘状、双边等，但数量都有限，远不及端刮器在石器组合中的分量。雕刻器也有一定数量，也可以分为修边与双面两式。

虎头梁石器工业最突出的特色应是其以楔形石核为主体的细石器技术。在已经报道的279件石核中，楔形石核的数量高达236件。虎头梁遗址楔形石核经盖培先生等研究，还可以划分出几种不同技术类型，即河套技术、桑干技术与虎头梁技术。这些技术总体特点是应用两面加工方法首先预制出楔形石核的毛坯，然后分别打制出台面与剥片面。采用两面加工方法预制出细石核毛坯，是本地区与华北其他地区细石器技术最明显的区别。类似的楔形石核在北方其他地区也尚很少见到。

虎头梁细石器文化的技术发展也表现在精致的装饰品加工方面。在虎头梁早期的发掘曾发现装饰品13件。这些装饰品是采用贝壳、鸵鸟蛋皮、鸟的管状骨及石块等穿孔制成。透过这些产品清楚可见，虎头梁居民也已经采用了穿孔和磨制技术。在虎头梁的好几个地点还都发现过赤铁矿，其中最大的一块长35毫米。另外还有红色的泥岩遗存，估计这些也是用来染色的材料。

#### （二）籍箕滩遗址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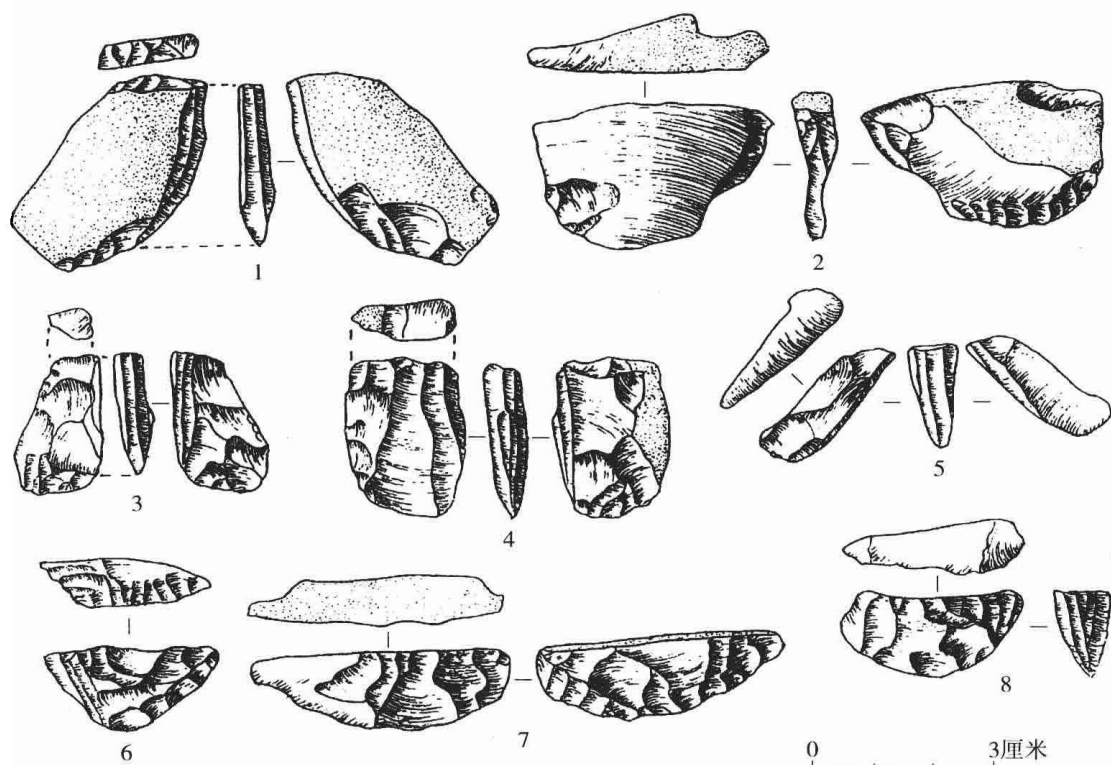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阳原盆地的中部，有更多与虎头梁类似的细石器遗存发现。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桑干河南岸，东北距虎头梁不足10公里的籍箕滩遗址群。遗址所在的区域是高出桑干河面约150米的台地，台地的中、下部是河湖相的泥河湾层，上部为马兰黄土。一些季节性的河流由南向北，切割台地，注入桑干河。同虎头梁的发现一样，籍箕滩遗址群也埋藏在桑干河支流的2级阶地堆积中。由籍箕滩向东至马家窑、向南至保伸观与平顶村、向西至槽村一带，面积1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都有同样的细石器发现<sup>[18-20]</sup>。

籍箕滩遗址群的发掘区位于籍箕滩村北约100米处，共发掘了3个探方。探方之间远者相距超过百米。从发掘探方的剖面观察，籍箕滩地层在表土层下为约2米的灰黑色砂质黏土；第3层即为约1.5米的灰黄色砂质黏土层，含石制品与动物化石；第4层是约半米的杂色砂砾石层，局部也有文化遗物发现；最下是深度不详的灰白色砂层。地层的堆积层序与虎头梁一带很相似，只是厚度不及后者。

籍箕滩3个探方中出土的石制品数以万计，不过其中也是断块与碎屑占据了很大部分。石器原料的主体部分与虎头梁完全一样，也是粉红色石英岩，很显然应该是拥有共同的石料产地。少量的玛瑙与燧石的使用情况也与虎头梁遗址群一样，但黑色角岩使用的频率则高于虎头梁。

籍箕滩发现的细石核也有多达上百件，绝大部分也是典型的楔型石核。石核从选料、预制毛坯到剥片均都与虎头梁相近。船底形与锥形石核等没有发现。石制品中为了调整台面而从楔形石核上剥下的雪橇状削片，在这里亦有较多的发现。这些特点说明籍箕滩所使用的细石器技术与虎头梁是很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有研究者称其为同一时期分布在桑干河两岸的姊妹文化（图二）。

不过籍箕滩在石器组合方面却与虎头梁有一些差别。虽然虎头梁发现的各种石器类型在籍箕滩也都可以看到，但出现的频率却有所不同。籍箕滩最多的石器类型是凹缺刮器，占整个石器组合的差不多6成。这些凹缺刮器有一击而成的凹缺刃口，也有打出凹口后再经仔细修理者。这与虎头梁等其他同时期遗址的石器组合以端刮器为主的情况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当有其特殊的功能。另一与虎头梁有所区别的是铍状器发现的数量也较多。



图二 籍箕滩遗址的楔形石核（据谢飞，2002）

### （三）尉家小堡遗址

近年来类似虎头梁细石器工业的发现更多，分布也更广泛，在距离虎头梁村以西60公里远的山西省的阳高县境内也有发现。紧邻阳原县的阳高县东小村镇的尉家小堡遗址是1996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并发掘的细石器遗址。该遗址也埋藏于桑干河支流的2级阶地堆积中。其地层堆积比较简单，在灰黄相间的泥河湾层之上，即不整合叠压着浅褐色砂质黏土层，该层厚约1.1米，其下部约15厘米为细石器遗存集中分布带。该层之上为0.5米厚的浅褐色砂质黄土（表土层）<sup>[21]</sup>。

尉家小堡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也十分丰富。集中在近2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多达数百件石制品的发现。石制品的原料主要是硅质岩与火山角砾岩。石制品上均不见自然石皮，尤其是硅质岩类的节理发育，很多石片等石制品带有明显的节理面，说明石料的来源是原生岩层，而非砾石或风化剥落、暴露时间较长的岩块。这种情况在虎头梁地区也有发现，应是当时人类在原生岩层中开采石料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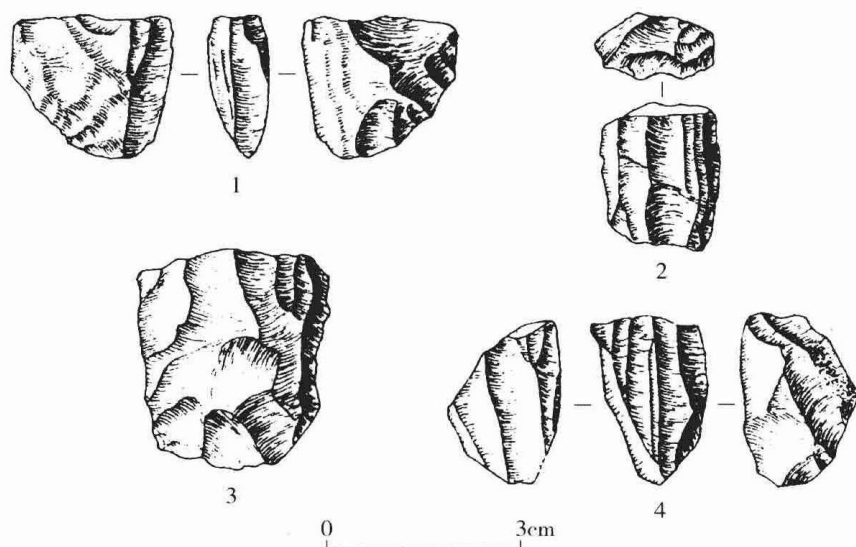
石制品的种类包括了石核、石片、细石核、细石叶、石器、断块及碎屑等。普通石核与细石核的数量接近，前者12件，后者13件。细石核均为楔形石核。普通石片与细石叶的比例则相差悬殊，普通石片的数量高达250多件，几乎占全部石制品的半数，而细石叶则只有17件，不足全部石制品的3%。石器以边刮器为主，亦可见到端刮器。

### （四）油坊遗址

油坊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的东部，桑干河南岸，距现代桑干河床约2公里左右。当地是大田洼台地北缘的斜坡区。其地层堆积的最上层为现代耕土层，厚约0.3米；第2层即为文化层，浅黄色粉砂质黄土，较松散，具垂直节理，中上部含石制品、灰炆层，以及动物化石等，厚约6.5米；第3层为侏罗系角砾岩，厚约4米；最下为前古生界火山角砾岩，出露部分厚约5米。油坊遗址尚未有绝对年代测定数据。根据泥河湾盆地内晚更新世黄土地层以及阶地的形成时代的比较，大致可以推断，也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晚阶段，但要早于桑干河2级阶地上比较广泛分布的虎头梁细石器工业。文化性质也明显有别于后者。

油坊遗址发现的石制品总数多达3000多件。其原料主要是就地取材，在附近的冲沟和山坡上均可采集到这种硅质火山角砾岩或燧石。但从对石料选择的情况看，当时人类对各类岩石的性质有较清楚的认识。

从石制品观察，一些单台面石核呈锥状或扁锥状，台面多经过修整，石片疤窄长规整。在经第二步加工的石器中，有非常典型的石叶坯材存在，可以肯定有石叶技术的存在。细石器技术在油坊遗址更为明确，在经过统计的近700件石制品中，细石叶的比例高达13.2%。细石核的数量虽然不多，但类型丰富，包括楔形（锥形）、柱形与船底形等不同类型。油坊的石器组合，也以端刮器为主，其次为边刮器、尖状器等，



图三 油坊遗址的细石核（据谢飞等，1989）

雕刻器、琢背刀等亦可见到<sup>[22]</sup>（图三）。

#### （五）二道梁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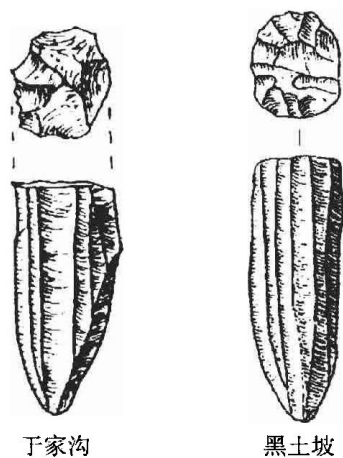
二道梁遗址是近年来泥河湾盆地细石器的一项重要新的发现。遗址位于盆地东侧大田洼台地的北缘，在相当于桑干河 3 级阶地的冲沟阶地堆积中。最下层为泥河湾层，其上即为黄灰色粉砂层，厚度仅为 18 ~ 20 厘米，含大量细石器文化遗存，再上为浅黄色砂质土，厚度达 1.6 米，最上为 3 米厚的黄土堆积<sup>[23]</sup>。

在近 20 平方米的发掘区，有一处直径约 70 厘米的红烧土。其间有石制品、炭屑与烧过的动物骨骼碎片等。在红烧土周围，还散布着也经过火烧，但还可以拼合的石块与石片。这里发现的石制品原料几乎都是燧石。在多达上千件的石制品中，石片（包括断片与裂片）的数量多达 800 余件。断块也有 170 多件。石器则有边刮器、凹缺刮器、端刮器与雕刻器等。修理精良，数量也较多，是二道梁石器组合的一个特点。尤其突出的是船底形细石核的发现。与盆地内其他细石器遗址完全不同，二道梁遗址发现的细石核均为船底形。

#### （六）黑土坡遗址

黑土坡遗址位于盆地东侧的头马坊村附近。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即经过发掘（谢飞，1989）。文化遗存埋藏在桑干河北岸的 2 级阶地的顶部较黏的灰黑黄绿色的堆积中。文化层厚度为 70 ~ 90 厘米，直接叠压在表土层下。文化层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为距今  $7530 \pm 100$  年。已经属于新石器时代。但这里的两次发掘仅见零星的夹砂红褐色陶片，却有较丰富的石制品与动物骨骼碎片等文化遗存<sup>[24]</sup>。

石制品中磨制石器很少，仅见砺石、杵与石环等。打制石器却十分丰富，包括普



图四 于家沟与黑土坡的  
锥形石核

通石核、石片、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石器等。石器原料以褐色的燧石为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细石核的数量虽多，但类型却很单一，主要为锥形。细石叶也很多且典型，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经过加工者。工具则主要是修理精致的端刮器，以及铍状器。

黑土坡遗址的发现与于家沟遗址 2 层细石器的文化特点十分接近，无论是石器原料选择，还是细石核加工技术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图四）。

## 二、讨 论

### （一）技术与原料特点

包括华北地区在内的东北亚地区的细石器技术一直是该地区史前学者关注的重点。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探讨。虽然在地域辽阔的东北亚地区存在着许多区域与时代差异的细石器技术，但就整体而言，仍可划分出两种基本类型，即以两面加工技术为基础的制坯和窄长条形台面为特征的楔形石核技术，以及非两面技术制坯与宽台面特点的细石器技术<sup>[25~27]</sup>。在这两种基本类型之下，不同地区还可以细划分出多种亚类型。前者如前者在泥河湾盆地，有学者划分了虎头梁、阳原、桑干与河套类型等<sup>[28]</sup>。后者更有船底形、锥形、半锥形、柱状以及漏斗状等多种<sup>[29~35]</sup>。也有学者进一步讨论到不同细石器技术类型分布的区域性特点<sup>[36~40]</sup>。

前述的泥河湾盆地已经发现的细石器技术明显有两类，即楔形与非楔形。前者包括虎头梁遗址群、籍箕滩遗址群以及尉家小堡；后者则有油坊、二道梁与黑土坡。

除了在虎头梁遗址群早期所发现的 230 多件楔形石核，新近发掘的马鞍山遗址的细石核经过更详细的统计，楔形石核多达 328 件，其余锥形、柱状以及船—楔状等类型的细石核加起来仅有 10 件，且并非十分典型。在籍箕滩遗址群发现的细石核也只有两类，楔形与不规则形。楔形石核为 117 件，不规则形者只有 4 件。在尉家小堡发现的细石核数量虽然较少，只有 13 件，但均为楔形。情况较为复杂的是虎头梁遗址群中的于家沟，其不同的文化层所发现的细石核的数量与类型有明显的变化。其中 3 层以下楔形石核也占绝对主导地位，如 3 层 b 所发现的细石核有 88 件，楔形石核为 86 件，另外仅见 2 件不典型的柱状与似船形细石核。而 2 层发现的 3 件细石核则分别为典型的锥状和柱状类型，但本层的时代很晚，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由此可见，除了时代较晚者例外，在从虎头梁与籍箕滩遗址群向西一直到尉家小堡，这些遗址的细石器技术非常一致，均有两面加工细石核毛坯技术，并产生以窄长的台面为特色的楔形石核技术

为主导, 不见或偶见其他类型的石核。后者的数量很少, 且技术亦不典型。

与前者不同, 在盆地东部新发现的二道梁遗址, 所发现的石制品数以千计, 其中也有较多的细石核发现。虽然具体的统计数据尚未发表, 但据已经发表的资料看, 均为船底形细石核<sup>[41, 42]</sup>。同属盆地东缘的黑土坡遗址, 虽然其时代较晚, 已属于新石器时代, 但仍有较丰富的细石器发现, 其细石核几乎均为典型的锥状类型。与前两者同处盆地东部的油坊遗址发现的细石核则更有趣。这里的细石核共有 13 件。虽然在已公布的材料中有较多划分为楔形类, 但据描述与线图情况来看, 至少 6 件侧面观呈锥形, 台面圆形或椭圆形的窄楔状者, 应不是典型的楔形石核技术的产品。另外的 2 件船底形, 3 件柱状细石核则都很典型。这几处遗址的相距较近, 所应用的细石器技术的共同特点是不见楔形石核, 区别则分别以船底形或锥形与柱状等细石核技术为主导。

泥河湾盆地内不同细石器遗址所选用的石器原料也有明显差别。盆地中部的虎头梁遗址群、籍箕滩遗址群, 一直到山西阳高境内的尉家小堡遗址, 生产细石器的原料主要是石英岩或硅质岩类。这类石料质地细密均匀, 颜色鲜艳, 多呈粉红至黄褐色, 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据调查, 这类原料产自盆地南侧的山区, 一般距遗址为 10 多公里以上。而保留在石制品上的石皮特征则显示, 这类原料既非砾石, 也非风化岩块, 而是直接采自原生岩层<sup>[43]</sup>。

而盆地东缘的几个遗址, 则均采用燧石原料。这种石料的质地较均匀致密, 多呈褐黄色。在油坊遗址的附近就可以采到。距遗址只有数百米之遥的周家山就有这类岩石的原生岩层出露。不过与前者不同, 这类原料的表面常可见到风化石皮。这说明石料是来自附近的风化岩块, 而非直接采自原生岩层。离周家山稍远的二道梁遗址以及黑土坡遗址, 也都采用燧石原料, 很可能也是出自此地。

## (二) 时代与地理分布

泥河湾盆地的细石器除了技术与原料方面的特点, 不同遗址的分布与埋藏情况也有所不同。如前所述, 如果按照地貌类型划分, 大部分遗址都埋藏在桑干河或其支流的阶地堆积中, 但油坊遗址埋藏状况却例外, 属于大田洼台地北缘的黄土状堆积。同属阶地堆积的遗址, 也还有所区别。新近发现的二道沟遗址位于桑干河支沟的 3 级阶地, 而其他遗址则都属于 2 级阶地。2 级阶地本身可能也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堆积阶段。盆地中部以楔形石核技术为特色的细石器遗址往往都埋藏于 2 级阶地堆积较上部的黄色砂质黏土或与其相当的砂砾石层。在其下部, 往往可以发现加工比较精致的石片石器, 如新近发现在虎头梁地区的梅沟地点等<sup>[44]</sup>。而以典型的锥形石核技术为代表的细石器遗址, 则埋藏在 2 级阶地最上部的褐色或黑褐色堆积中。

上述埋藏特点直接反映了遗址的时代特点。按照桑干河阶地形成的时代来看, 地处 3 级阶地的二道沟遗址的时代当最早。2 级阶地上部黄色土堆积中发现的大量楔形石

核细石器的时代显然要晚于二道沟。而2级阶地最上部的褐色或黑褐色土中的锥形石核的时代显然要更晚。这一相对年代顺序也得到绝对年代的测定数据的支持。二道沟遗址的动物骨骼样品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 $18085 \pm 235$ 年。马鞍山遗址火塘中的炭屑样品的AMS碳十四年代为距今 $13080 \pm 120$ 年。黑土坡遗址的碳十四年代则为距今 $7530 \pm 100$ 年。遗憾的是油坊遗址既无绝对年代测定数据，也无法根据地层学特点与阶地堆积中的诸遗址做相对年代的比较。不过研究者根据本地区黄土地层的时代特点，提出油坊遗址的时代当与二道梁遗址相近或略早的看法应当是合理的推测<sup>[45]</sup>。

由此看来，泥河湾盆地的细石器大致分布在三个年龄阶段：以二道梁和油坊遗址为代表的早期阶段，大致为距今18000~20000年；以虎头梁遗址群为代表的楔形石核遗址群的时代则在距今约13000年；以黑土坡遗址为代表的锥形石核的年代为距今7000~8000年，是盆地内细石器最晚期阶段，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

除了时代特点，泥河湾盆地细石器的分布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如前所述，以色彩斑斓的石英岩为原料的楔形石核技术的细石器，主要分布在盆地中部的桑干河及其支流两岸。包括了虎头梁遗址群、籍箕滩遗址群以及尉家小堡。遗址的分布密集，文化堆积巨厚，文化遗存丰富。而时代较早的遗址，包括二道梁与油坊遗址，还有时代较晚的黑土坡遗址等，主要分布在盆地的东部地区。这些遗址的石器原料以燧石为主，细石器包括了船底形、锥形及柱状石核技术。

### （三）生存策略与社会发展

泥河湾盆地细石器技术及其时代与空间分布的特点应该与晚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初期活动在盆地内的古人类的生存策略与社会发展情况密切相关。换言之，石器技术与遗址聚落形态的选择与变化应该是当时人类适应晚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之初泥河湾盆地的资源环境及其变化而采取的生存对策。

泥河湾细石器的主人生活在这一地处北纬40度的冀西北的山间盆地，经历了从最后冰期最盛期向冰后期过渡，从冰期寒冷的最盛期逐渐过渡到冰雪消融、气候转暖的全新世早期。气候环境的剧烈变化无疑会对当时人类的生存条件造成很大的影响<sup>[46]</sup>。在海拔高度近千米的盆地内虽然地势平坦，有桑干河冲击形成的河谷平原，全新世以后，这里是较为温暖的稀树草原环境，宜农宜牧。但在冰盛期，这里却十分干寒，只有稀疏的草原与食草类动物可供赖以维持生计。这种情况可能是导致距今18000年前后阶段的细石器遗址数量很少的重要原因。到目前为止，只有二道梁与油坊等少数发现。且遗址的文化层均较薄，发现的文化遗存也较有限。

随着冰盛期的结束，到距今15000年前后，哺乳动物化石、孢粉分析以及其他古环境方面的资料都说明当地的气候虽然仍比现代干凉，但已逐渐转变为水草丰盛的草原，为虎头梁遗址群等楔形石核技术的主人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文化遗存的情况

显示泥河湾盆地以虎头梁遗址为代表的细石器工业应该是适应的专业化狩猎活动的产物,主要靠狩猎草原上生活的动物群为生。巨厚的文化堆积与大量文化遗物的发现,特别是以火塘为中心多层居住面在同一遗址内反复出现的现象,直接证明当时人类的群体数量很大,在同一地点可以有很长时间的居住停留。如近些年来发掘的马鞍山与于家沟等遗址的发现都说明了这种情况。马鞍山遗址多种类型的火塘以及于家沟遗址距今 11000 多年前陶器的出现,都显示这些遗址的居民生活内容更为丰富,并且可能已是这些遗址较长时间的定居者。

到距今 7000 ~ 8000 年,随着全新世暖期的来临,新石器时代的定居村庄也已在泥河湾盆地出现,如在于家沟遗址附近的姜家梁遗址的发现。然而就在广泛使用新石器的定居者已经出现的同时或稍早,在泥河湾盆地内仍可见到典型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如黑土坡与于家沟 2 层典型的锥形细石器技术的发现。无论这些细石器技术的主人与盆地内同期或稍晚的新石器居民是相同的人群与否,这一阶段细石器技术在盆地内所占的重要地位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也为追索泥河湾盆地细石器技术源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有关泥河湾盆地细石器在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与农业起源这一重大社会发展过程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早就受到学者的关注并进行过专门讨论<sup>[47]</sup>。不过对发展的具体细节却还缺少详细的探讨。如上所讨论,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并不应该仅仅是磨制石器与陶器等标志性文化遗物的出现,而还应该是在环境变迁、人口压力、资源、技术与社会发展等多重因素的互动之下,盆地内细石器主人不得不重新调整他们生存策略,由此带来的人类技术与行为变化与社会发展的结果。

以泥河湾盆地已发现的细石器情况来看,早期的细石器遗存仅发现的盆地东部燧石原料产地的附近,文化层也较为单薄,且遗址也均为单个分布。这种聚落形态反映当时的人口可能还很少,且流动性较强。显然是当时人类适应泥河湾盆地在最后冰期最盛期的严酷环境条件的结果。到虎头梁楔形石核技术阶段,开始远距离产地大规模开采原生岩层的石料,专业化生产楔形石核等石器工业,遗址数量众多,成群组密集分布,文化堆积巨厚,这些显然是适应环境转暖,人口增加等情况的结果。这种状况又会对定居、制陶与磨制石器等技术出现产生促进作用。由此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与结果,最终促成旧、新石器时代的交替。

观察泥河湾盆地细石器技术的变化还应该有人类学的视角。在泥河湾盆地细石器技术纷繁的时空变化现象的背后,不应该仅仅是当时人类的适应策略与手段,也应该会受到持不同细石器技术人群间的传承与交流等文化因素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泥河湾盆地,在最后冰期最盛期阶段,最早出现的细石器遗存应该是与石叶技术共存的油坊遗址。油坊的细石器技术包括了锥形、柱状与船底形,

是否有典型的楔形石核技术还有待更多材料的分析。其后或差不多同时，则有以船底形细石器技术占主导地位的二道梁遗址的发现。两者均出现在盆地东缘。到最后冰期最盛期的结束，距今15000年前后，楔形石核技术突然在盆地内繁荣起来并持续到差不多晚更新世结束之时。楔形石核细石器则更集中分布在盆地的中、西部。不过随着全新世的来临，楔形石核技术却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则是典型的锥形石核技术。这一阶段的锥形石核技术的遗址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盆地的东部和中部却都有其踪迹可寻。

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视野扩大，很容易发现典型楔形石核技术与非楔形石核技术的细石器技术的分布亦有区域性特点。除泥河湾盆地以外，在中国北方已经发现的细石器遗址，几乎没有见到以楔形石核为主导的细石器技术。在泥河湾盆地以东到冀东北，向南一直到鲁南、苏北与豫中地区，已经发现的细石器主要是以船底形石核技术为主导；但在泥河湾盆地的西南，典型遗址主要分布在山西南部至陕西境内，更多是以锥形、柱状及船底形共存的细石器遗存。上述情况显示，尽管还有更多的区域性特点，但中国北方细石器技术主要是以船底形、锥形及柱状等非楔形石核技术为主导。泥河湾盆地的楔形石核技术的出现与繁荣则如昙花一现，突然出现，繁荣了数千年之后，又突然销声匿迹。楔形石核技术这种在泥河湾盆地以及中国北方出现与分布的态势，很难完全用石器原料利用或是生计策略等因素来解释，而更可能还受到晚更新世末人类的迁徙或文化交流等历史活动的影响。不过目前所发现的材料以及研究的深度还比较有限，对这种现象更确切的认识还有待于更多遗址的发现以及与周边地区与国家同类遗存的详细比较研究结果。

### 三、结 语

近半个世纪的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结果显示，泥河湾盆地的细石器遗存非常丰富，并不仅仅是早年发现的以虎头梁楔形石核为代表的单一细石器工业。随着时代的发展，盆地内不同区域的细石器遗存出现明显的差别，展现在细石器技术、石器原料的选择、生计方式以及聚落形态等多方面。

楔形石核与非楔形石核构成盆地内细石器技术的最基本的区别。船底形、锥形等非楔形石核技术最早出现在盆地东部。其后楔形石核技术发展至顶峰并主要流行在盆地中、西部，锥形与柱状石核技术则在盆地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仍有发现。

持不同细石器技术的人群在石器原料、栖居形式等生存策略的选择也有明显不同的表现。早期人群就近选取石料，流动性强遗址数量少、规模亦小。楔形石核拥有者则远距离开采石料，居址规模大，居住稳定，并且开始拥有制陶与磨制石器技术。

虽然楔形石核技术在更新始末的泥河湾盆地得到空前发展,但其发展态势,尤其是与非楔形石核技术早晚有明显联系的情况比较,则有如昙花一现。这种情况说明泥河湾盆地细石器文化发展的背后可能隐藏更深层的原因,应该与当时人类适应环境的生存策略以及不同人群的迁徙与文化交流等活动有关。所以跨地区与国家的考古学术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泥河湾盆地细石器研究的迫切任务。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号:08BKG004)。

## 参考文献

- [1] 卫奇, 1991,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地质序列。《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会议论文集》,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61 ~ 73。
- [2] 谢飞等, 2006, 泥河湾旧石器文化。石家庄: 华山文艺出版社, 1 ~ 222。
- [3] 盖培等, 1977, 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5 (4): 287 ~ 300。
- [4] 盖培, 1984, 阳原石核的动态类型学研究及其工艺思想分析。人类学学报, 3 (3): 244 ~ 252。
- [5] Tang, C. & Gai, P., 1986. Upper Palaeolithic Cultural Traditions in North China. *Advances in World Archaeology*, Vol. 5, eds. F. Wendorf & A. E. Close. London: Academic Press, 339 ~ 364.
- [6] 谢飞, 1991,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研究新进展。人类学学报, 10 (4): 324 ~ 332。
- [7] 同 [2]。
- [8] 谢飞, 2006, 泥河湾。北京: 文物出版社, 1 ~ 329。
- [9] 梅惠杰, 2007, 泥河湾盆地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 阳原于家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 ~ 131。
- [10] 同 [1]。
- [11] 盖培等, 1977, 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5 (4): 287 ~ 300。
- [12] 谢飞等, 2006, 泥河湾旧石器文化。石家庄: 华山文艺出版社, 1 ~ 222。
- [13] 同 [9]。
- [14] 孙秀丽, 1999, 马鞍山遗址石制品初步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 ~ 66。
- [15] 刘利红, 1999, 瓜地梁细石器遗址的发掘和初步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 ~ 41。
- [16] 同 [1]。
- [17] 朱之勇等, 2006, 虎头梁遗址楔形细石核研究。人类学学报, 25 (2): 129 ~ 142。
- [1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1993, 籍箕滩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遗址。文物春秋, (2): 1 ~ 22。
- [19] 同 [2]。